

鬼子 广西罗城人，国家一级作家。1996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，主要作品有瓦城悲悯三部曲：《被雨淋湿的河》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》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。

苏通之死

鬼子

错 误

苏通说，他是苏童的同学。

苏通的真名当然不叫苏通，就如同苏童的真名也不叫做苏童。苏童是为了当作家才叫做苏童的，苏通也是，而且写的也是小说。但没人知道是先有苏童而后出了苏通；还是先出了苏通而后才有了苏童。我曾在他酒意懵懂的一个黄昏里突然问过他，他先是木然地呆滞了一下，随后猫头鹰一般迅速清醒了双眼。他告诉我，当时的苏童还不是如今的苏童。我知道他这话的意思，但我不肯轻易放弃我的猜疑。我说都是进了大学之后才

有的吗？他哼了一声说这是当然的，然后微微地眯起眼睛，摆出一副回忆的样子来，仿佛十分认真地走回到某一条旧时的林阴道上，一步一步地踩着那些霉迹斑斑的落叶，默默地独行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，最后抬起了头，用一种不带任何酒意的目光，在我的脸上迅速地敷衍了一眼。他说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在我听到有人叫做苏童的时候反正我已经叫了苏通，而苏童听到他有一个同学叫做苏通的时候，他也早就已经是苏童了。这句话让人想起一种锤炼过的台词。我心想这对他无疑是个难处，就不再追究。可他却自己说，他的年龄比苏童大一些。说这话时他很看重我的表情。我问他大多少？他说差不多一岁吧，至少也有半岁。我想，莫非他想告诉我，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称得上是人家苏童的师兄！但他自己不好明说。其实，在我们谈话的时间背景里，苏童的名声早已像某某如意的电视广告，因为在我们这些人的耳目里没完没了地缭绕而无人不知了。然而，苏通死后的第二天，我在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，却发现他身份证上出生的年月日，与报纸杂志上介绍过的苏童，完全的相似。

苏童出生于1963年1月23日。

苏通竟也出生在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。

这使我一直疑惑不解。

莫非苏通曾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买了一支路边地摊上的退色灵，然后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上的年月日给修改了？但那样的先决条件，必须是在迁移户口后自己拿在手上的那几天，难道改完之后，他苏通又突然地后悔了，觉得自己应该在某些方面比苏童略大一点？

然而，事实是明显不同的，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拍了电影，《红粉》也拍了电影，而且在国内外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，接着还出了文集，可苏通，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苏通死于X城一家名为蝴蝶宾馆的黑夜的深处，那个时间一直被人们传说为1995年5月23日。其实，准确地说，他死于5月24日，因为23日在当天深夜的12点已经全部地结束，跟着而来的虽然还是茫茫的黑夜，但24日已经在黑幕之中展开了自己的手脚。人们总是习惯地把天亮之前的时间统统错误地叫做昨夜。也不知道我们的前人是怎么想的，为何要把一天的开端放置在黑夜的中间？让人怎么思索都无法逃脱某种夜色给人带来的压抑与沉重。

苏通死于那一夜的12点之后，当时的时间已经在第二天的路上爬行了一刻多一点，除了当事人，我是唯一可以证明那一时间的人，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睡下，隔壁房里突发的一声喊叫，尖刀一样从我的脑后直刺入心口，我被吓得从床上猛然坐起。那声音来自

与苏通同床的女人。当她接着发出第二声尖叫的时候，我十分恐惧地看了一眼手表，那个时间于是被我牢牢地记住了。

苏通的小说

1

苏通的死与他写过的一部中篇小说有关。

那是他自以为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，也是他死前的最后一部小说。在那部小说的整个写作过程中，苏通说，他的心就像一直淌着血，那感觉就好比随着抽出的屠刀，从猪脖子里飞泻而出的血水，带着一股灼人的气浪，一边挣扎一边泻进泥地上的木盒之中，整整泻了大大的一盒。

那一盒血红血红的东西就是我的那部小说，苏通对我打过这样的比喻。这个比喻，应该说相当的学生腔，但当时的他却说得一脸的认真。

那是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，为了它的完成，苏通把房门整整地关了五天五夜，他要把它赶出来，参加一个难得的小说笔会。

那是省作协和《……》文学杂志合办的一个笔会。为了开好那次笔会，作协把笔会的通知书提前一个月寄给了与会作者，但苏通没有及时收到。

那封信是上午10点左右丢进他们办公室的，那是一个风雨无阻的投递时间。那个时候苏通其实还在屋里，但那天早上他没有去办公室，他在收拾东西准备12点钟乘车下乡。苏通的单位总共只有两个人，一个领导和一个老百姓。当领导的那一位，早在半月之前就躺到医院去了，而且被医生无情地宣告还要躺下去，可能一直躺到被送进太平间的那一天。所以，准备下乡的苏通没有到医院去告诉他，也不再回到办公室去。

那封信是从他们办公室的窗口丢进去的，那个年轻的邮递员早已习惯了这一做法，自从他承担这条线路的邮递之日起，极少碰着那扇门是打开着的，好在他们的窗户是一种永远虚掩着的状态，手指一勾就打开了。窗子底下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设着一部黑色的电话机，他们的报纸和信件总是被丢在电话机旁。那天的那一封信，可能夹在一张《文艺报》中间，也许是丢的时候方向出现了一些偏差，报纸落在桌子上的同时，那封信从里边飞了出来，随后飘然地滑落到门背后的地面上。

那封信因此默默地躺在那泥地上。

苏通看到那封信的时候30天已经过去。信封上积了厚厚的灰尘，那上边的苏通先

生虽然是毛笔写的，却已经变得十分模糊。苏通先是用脚踢了它一下，然后才看清了那封信的来头。那时候的苏通一看到那样的信，总有一种暖流般的东西在心头漫流而过。他将信封在大腿上拍了拍，抖落残余的灰尘，然后从墙上取下一把剪刀细细地剪开。这类信苏通剪得十分的细心，他总是慢慢地只剪掉细细的一条边，让那信封依然十分的完整，因为这类信封他要好好地收藏，有时还得带在身边，用得着的时候亮在别人的面前，然后告诉别人他正在写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准备参加一个什么笔会。如果这些信封胡乱地撕开，就会变得不太好看，就很难从别人的眼色里，看到某种流淌着的敬羨的目光。苏通十分看重那种目光，一看到那样的目光，他就会随之高兴起来，然后进入一种心花怒放的佳境之中。

那封信告诉苏通，距离笔会报到的时间只剩了五天。

当时的苏通被这时间弄得有些心慌意乱，仿佛心上的某一个地方被人紧紧揪住，他的嘴里当即吐出几句骂人的话，最后无奈地望了望门外的天空。天上的风云当时正混乱成一片，在忙着筹备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。苏通转身把门关上，拿好那封来信，回到了自己的屋中。

那个时候的苏通还是孑身一人，距离那个叫做路意的美丽的女子，还有着相当长的时间。

屋里如同黄昏。时间只是下午4点刚过。苏通把灯早早地打开，然后埋在沙发的深处把那封信又看了几遍。当时的屋里不仅仅只是昏黑，而且有一种相当难闻的霉味。毕竟关闭了一个月的房门，一些原来吃饭喝汤时跌落在地上的油渍，早已成长为乱七八糟的霉斑。苏通望着那些遍地的霉斑，心想我得在五天内把一个中篇小说赶写出来。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样的机会，因为《……》杂志在他的眼里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镇刊物之一，尤其是在现实主义作品方面，谁在上边发了小说，苏通都觉得那是在现实主义的高山上爬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梯。再则，苏通很明白自己属于哪一类的小说作者。

埋在沙发里的苏通，当时浮想联翩。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就在这时降临了。大雨喧闹地打在他的房顶上，把长期巴结在瓦片下的灰尘，激打得纷纷扬扬，满地飘落。他等待着雨的停止，然后出去买回了一箱方便面，一条香烟，还有一瓶雀巢咖啡。

2

苏通说，那部小说在他的脑子里是现成的。天一黑，小说就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清晰起来，那感觉就像慢慢走近远方的某一棵大树。他无需太多的构思。刚刚结束的乡下

经历，被他看成是一部天然的长篇小说。但他要写的只是一部中篇，也就是那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大段。他觉得，只需要把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从头写来就是了，用不着玩弄什么叙述花招。苏通不喜欢玩弄叙述上的任何花招，他觉得那些现实主义的大作品从来都不是花拳绣腿；他对逃离现实的那些作家也充满着说不出的反感，尤其是那些置民众的疾苦而不顾的作家，他觉得那些现实主义的小说大师，没有谁不是手握锋利的大刀而屹立于人世的。

小说的最初一段走着一个人。

那个人独自走在一条阳光白花花的路上。苏通说那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。他去的是一个边远的小山村。那是他下乡不到半个月的一天中午。到达那个山村需要半天的路程。他要求自己必须在太阳落山前赶到。匆匆走着的苏通，手里掂着一把小小的钥匙。那是一把手铐的钥匙。十天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和五个工作队员，一起摸进了那个小山村，在一棵苍凉的大树下敲开了一扇房门。敲门的声音倒不是十分的吓人，最先惊醒的是一个老人，他问了一声谁呀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门外的苏通和另外的五个人，旋风般卷进屋里，朝一个挂有红布门帘的房间扑去，所有的手电筒把一张简陋的床铺照得如同白昼，整个画面极像旧日的某一个土匪窝在电影中的特写。最先被惊起的是一个女人的尖叫，但那张开的大嘴还没有合上，就被她丈夫的一张大手紧紧地封住。整个受惊的过程就此凝结成了一个独特的画面，没有像作家和导演们时常安排的那样紧紧地搂在一起，也许是来不及，也许是不知怎么才好。这时，有人严厉地叫出了那个男人的名字。那男的叫李后山。李后山的手当即从妻子的嘴巴上惶然滑落。他迟疑了片刻才把一丝不挂的身子从混乱的被窝里挪了出来，两只手紧紧地保护着胯下的羞物，好不容易才背过电筒的光亮，跌跌撞撞地穿完了衣裤。一副亮灿灿的手铐迅速地锁住了他的两只手腕。李后山的父母是年迈的老人，他们颤颤巍巍地愣在堂屋中央，嘴里惶惶地低唤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那声音就像深夜远处的一种鸟叫。苏通的组长只对他们说了一句我们是县里来的，就把李后山带到了门外的路上。当时的李后山，没有跟他的妻子交代一声什么，也没有给他的父母留下一句话，他只是一声不吭地跟着他们走。

路很黑。

那个晚上的月亮不知去向。

李后山被押在中间，他的前边是三个人，他的后边也是三个人。每个人的手上都亮着手电，那是出门的时候当成工具发的。李后山的身后就是苏通，苏通的眼睛在夜里不太好用，所以给李后山的照顾自然不能太多，但前边的李后山却在黑里走得很熟，苏通

的偶尔照顾，反而使他时不时的仿佛看不清路在何方。出了村头不远，是一条水泥拦河坝，那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号召修的。过河的路就在拦河坝的顶端。

苏通的小说在拦河坝上突然拐了一个急弯。

坝面不是太宽，也不是太窄，有河水在脚蹠上滑软地漫过，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深深的坝底。苏通觉得，谁跌下去都是十分危险的，尤其是双手失去了自由的李后山。走在坝上的时候，苏通便将身子紧紧地靠在李后山的上边，轻轻地托着李后山的一条胳膊。当时的苏通并不知道李后山因何被捕。可他没有想到，走到坝心的时候，李后山却猛地甩脱了他，身子一晃便消失了。苏通吓得一声大叫，所有的人都吓得慌了手脚，所有的电筒光在坝底乱成了一片。

坝下的河水到处翻滚着无情的漩涡和恐惧的白沫。

当时的苏通被吓得半死，他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。他想如果李后山顺势给他一脚，他的生命将不复存在，留下来的只会是一个幽灵般的传说，在深山里经年累月地飘荡。

李后山却没有死。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，他便浮现在了一柱随便扫射的电筒光里。那是远离坝底的一处河滩。苏通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潜游过去的，因为他的双手仍然紧紧地锁着那副牢靠的手铐。漆黑的天空这时突然射出一声枪响。六个人里没有谁是警察，苏通想，那枪一定是组长打的，身为一组之长，有枪的只能是他。

枪响之后，组长大声地吼叫：趴着别动！否则要你的命！

河滩上的李后山晃了晃，迅速站了起来。他没有马上逃跑，他仰望着大坝的顶端，也大声地喊叫着你们别开枪！我不是坏人。他说我要是坏人我就会把我身边的那个人一起撞下坝来。说完转身跑进了漆黑的远处。手电们忙乱地照了一下，很快就什么也照不着了。苏通觉得奇怪，当时怎么没人建议该去抓他回来。大家只纷纷地议论了一下说是他妈的水性真好，真他妈的胆大。

那个逃跑的李后山，后来便成为了路上的主要话题。只有苏通一声不吭。苏通的小说里说，他的心在那黑色的天幕里，早已经跟着不知去向的李后山逃跑远去了。

小说里的苏通，从此无法平静。

他不知道李后山犯了什么，他的脑子老是闪烁着两只被铐得死拢的双手。他想那李后山下怎么办呢？也许他跑到了野外好几天不敢回家？也许，当天晚上就摸回了那间挂着红布门帘的屋里。但他想不出李后山能把那手铐怎么办？老是那么铐着，上厕所都得要人帮忙。这些问题把苏通折磨了整整一个星期。那一个星期里，苏通又跟着到别的村子抓回了好些人。工作队员们一共分为五组。抓回来的人统统关在乡公所内一个封闭

得极好的小房间。但苏通总是忘不了那个李后山。终于他悄悄地对组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问是不是可以让他一个人再次前去，他说他有把握把李后山带到乡里来。组长说你以为那手铐还铐在他的手上吗？苏通说完全有这可能。组长说要是真有把握你就去吧。苏通说你得把手铐的钥匙给我。组长说你要是打开了他手上的手铐，他还会跟你到乡里来吗？可苏通说，我要是没有钥匙在手里，他凭什么听我的？组长说你让我考虑考虑。夜里的组长不知道如何考虑，天亮时就把钥匙悄悄地给了苏通。

苏通因此上路了。

那部小说苏通一共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到此结束。

3

苏通到达那个小山村的时刻是小说第二部分的开始，为了描写那还没有落山的太阳依然血淋淋地悬挂在山的尖端，苏通花了不少充满象征意味的笔墨。他把霞光写成了泪流遍地的狗血，他把那些此起彼伏的群山比作了一头头依偎着就要死去的野牛。而在他苏通的屋里，已是第三天的晚上。苏通的那一条香烟已经烧完了大半，方便面也吃空了大半个箱子。

晚霞中的苏通先是朝着村长的家里走去，如果不是村长那个富态的老母及时出面，门楼边猛扑而出的大狼狗将无情撕下苏通身上的无数块肉皮。村长的老母给苏通的感觉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，她告诉苏通，村长不在家，边说边将苏通硬是拖进了屋里。苏通喝完了一碗老人送到手上的白粥，说了一声还有急事，就起身走出了村长的家门，快步走向那间古树下的房屋。

那是一间上了年岁的房屋。

苏通站在那间老屋的面前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心酸。他有点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全村就村长家的那一座房屋是红砖红瓦的新房？李后山的老屋，却分明是他的爷爷解放前的某一年留给他父亲的，瓦檐下那高高的墙壁上，依然残缺不全地遗留着三四条土改时写下的红色标语，其中“打土豪”尤其耀眼，但苏通想象不出当年的情景，因为那时苏通还远远地没有出生。他想那个被手铐锁着的李后山可能也还没有出生。后来李后山告诉他年岁的时候，苏通因此吃了一惊，他没有想到李后山竟然比他还小3岁。因为身世和生活的不同，坐在他面前的李后山，却比他苏通苍老无数。

苏通进门的时候，李后山正坐在灰暗的堂屋中央，见了苏通当即呼地站起，但他没有转身奔逃的意图。他垂直着空空荡荡的双手，漠然地看着苏通。苏通的眼光在李后山

的两只手腕上惊讶无比地跳来跳去。

手铐呢？

我把它弄开了。说完李后山叫他的妻子到枕头下把手铐拿出来。

那手铐已被锯成了叮当作响的一串废铁。

苏通拿着那副烂了的手铐，心里一阵难受。他问李后山，那天夜里你说你不是坏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李后山说，我真的不是坏人。苏通说，那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李后山说知道。苏通说为什么？李后山想了一下，他说我说不清楚。苏通说你如实地说吧。李后山却又一再地说他说不清楚。他说我说不清楚的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李后山正在为难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他的母亲，还有他妻子，他的儿子都站在了苏通的身后，他们都望着苏通，也望着李后山，没有一人想到坐下。苏通想对他们开口，却发现他们的脸色都极为不好。苏通只好对李后山说，你要是不肯说，明天你就得跟我到乡里去。李后山没有说话。苏通说，你要是不去，哪一天深夜还会有人前来敲开你的家门，最终还是把你抓去。苏通还告诉他，说这几天已经抓了三四十个了，他们都被关在乡府大院一个很小的小房里，筷子似的一个挨着一个，所有的人全都撒尿拉屎在一个大木桶里，天亮了才让人抬到厕所倒掉，他告诉他，过几天还要戴猪笼帽游街，然后是开大会，然后是一个一个地罚款。苏通说的都是实话，他希望李后山说出他的真情实况。李后山听到罚款的时候，脸色上的伤心与恐惧乱成了一团。他问苏通罚款多少？苏通说至少一两千，多的四千五千不等。完了还要坐牢吗？李后山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苏通。苏通说这次抓的都不坐牢。苏通告诉他，坐牢的人是由警察抓的，这一次是县政府的工作队。被抓的都不是犯了什么大罪，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的治安。县里觉得不这样搞一次不行，任其下去，整个县的治安无法控制。但这最后的一句话苏通只写在自己的小说里，他没有告诉李后山。

之后的李后山便低下了头，他说我哪来的四千五千呢？罚一千我都没有。

他说他只是砍了村长的一棵杉树。

苏通以为已经明白了真相，他说你怎么乱砍别人的树呢？

李后山说你不会知道的。他说我说了你也不会知道。苏通说我是不知道，那你就告诉我吧怎么回事？李后山说，这事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，那时村长的新房才刚刚挖基。村长家的杉树林跟他李后山的杉树林挨在一起，村长家在山上砍杉树做房子的那一天，他也砍一棵留在那里，等干了水再扛到山外卖钱，没想到村长家搬木头回家的第二天他到山上一看，他的那一棵不见了。他想一定是那些给村长搬木头的人误以为也是村长家

的，就顺手扛走了，李后山到村长家刚一开口，村长却指着李后山大发雷霆，他一口否认说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差错。几天后，村长让人把李后山叫到了自己的家里，他问李后山我搬木头的那一天，有人看见你在镇上卖木头。李后山说那天他是在镇上卖木头，但那不是他的，他那是帮外边的一个亲戚家卖的。第二天，李后山让他的那一个亲戚从另一座山的背后跑过来作证。而村长却眯缝着眼睛问他，他远远地跑来证明你是帮他卖的，那谁来证明我搬了你的那一棵杉树呢？

李后山的怒火因此燃烧而起。

李后山说，头一天他从杉林经过，还看见他的那棵杉树好好地横在那里，他想绝对是他们看错了扛走的。李后山转身扛了一把大斧头跑到山上，愤怒地放倒了村长家的一棵杉树，而且当众扛回了他的屋后。村长几次叫人前来扛走，李后山就是不给，他说你要扛走我的这一根杉木，哪天深夜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新房。村长这才不敢再来闹他。

苏通心里说这就对了，因为所有被抓的人的名单，都是各村的村长在乡里开会时提供的。

苏通说那棵杉树还在你屋后吗？

李后山说在。

苏通说带我看。

那棵杉树果然还在李后山的老屋后横着。苏通拍了拍那棵杉树说，你不是说要卖了用钱吗？

李后山说我哪还有胆子卖掉呢？

苏通的心里又是一阵难受。

苏通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

李后山说我哪知道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要是为了这根木头罚我一千两千，我不如扛去送他算了。

那你的哪一棵呢？

李后山说就当我那杉林里没有长过那么一棵树呗。

苏通想了想，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要不怎么办呢？这大老远的一个山沟沟，谁来为你这么一棵杉树成立一个案子呢？那些乡警人数少得连大案都顾不及，谁来顾及一棵杉树呢？

苏通说你要是真的愿意，那就扛去给他，然后把事了了算了。

你能陪我去吗？苏通的小说里说，李后山的眼睛里冒着一缕缕可怜的烟。

苏通说我当然要陪你一起去。

李后山便弯腰扛起了那根沉重的杉木。

苏通发现李后山的内心明显是不太好受，他说你还是自己再想想。

李后山说还能有什么可想的吗？

苏通说，真要是去了，你可不仅仅是把木头给了人家，你还得给人家承认说是你错了。这事你得再想想。

李后山没有放下木头，他说承认就承认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苏通发现李后山的眼睛一直没有亮过，像是两枚使用了几代人的青铜衣扣，已经没有了本来的质感。

苏通跟在李后山的身后，把那根沉重的木头往村长的家里沉重地扛去。

这时，苏通在他的小说里写着：我的心当时比压在李后山肩头上的木头还要沉重。

4

苏通的小说并没有到此结束。

像那些曾经优秀过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，苏通在他的小说末尾突然一转，异常沉重地转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。

那是他回到乡府后的第三天的中午 12 点，当时的太阳已经十分的灿烂，他与另外三个工作队员去给被关着的那些人送粥。关人的那一个小房前边，有一条不大也不长的小走廊，那是给里边的人放风和提供吃食的地方。小走廊的前边是一个临时焊制的铁门。苏通提着那副已成废铁的手铐回到乡府的第二天，组长就让他在家里一边休息，一边协助看管犯人。苏通的内心也不情愿再去抓人，他知道县里有县里的难处和想法，但在他内心的深处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他给组长点了点头就答应了。但他没有想到，在那些争抢稀粥的犯人里，竟然冒出了李后山的脸孔。他的眼睛吓得一跳，盯着李后山有点不敢相信。李后山的眼睛也很快地发现了苏通，他把一个说不清内容的傻笑丢给了苏通，之后便用心地吃着他的稀粥，再也没有别的反应。苏通的心里很想上前问他一声为什么，但却走不过去。

小说的最后一段是那个傍晚，又到了给那些犯人送粥的时候，但苏通的影子已经不知了去向。

笔会

1

那次笔会把苏通和我安排成了后来的朋友，我们同住在一个双人的房间里。

在那之前我们并不相识，而且也没听说过他。他当然也没听说过我。那间双人房是他先住进去的。我把门打开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，用心地默念着他的那部小说。见我走进，马上放在枕头的一边，然后介绍，说他叫苏通。听到这一名字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好像被他打了一下。我说你这名字让人联想到苏童。当时的苏童正被《妻妾成群》烧得火热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苏通的脸色立即灿烂起来，他说苏童和我是同学。我说真的？他说当然真的，北师大中文系，八〇级的。说完眼光如水，将我淹没得不知所以。我的心里当时只剩下了无尽的敬意。能跟人家苏童的同学同住一屋，心想也算得是参加本次笔会的一大福分。

我看了一眼他放在枕边的稿件，问他你还没交？

他说还没有。

我说我早就交了。

他问你交给谁的？

我说是寄给作协的。

他说我昨夜才刚刚写完。

那你就直接交给《……》的来人算了。

他说我想也是。

晚上便让我跟他一起前去。临出门的时候，他笑笑地对我叮嘱了一句，让我见人的时候帮他介绍一句，说是苏童的同学。只想让他们在读我小说的时候稍稍用心一些，他说，我这小说是拼了命写的，被他们马虎了可就白来了。我给他点了点头，他的手掌便感激地落在了我的肩头上，格外友好地拍了两拍。

《……》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副主编和一个小说编辑。他们住的是一人一个单间。听会务组的一个小伙子暗中流传，说是有人事先打了招呼，一来是看稿安静；二来是其中的某一个爱好与女作者单独聊天。

我们进的当然是那个副主编的屋里。那是个中年人，不知流传中的那某一个是他还是另一个，我们走进的时候，屋里却纯洁得就他一人，清新的空气里也还没有让人闻

出何等女士留下的芳香。但那门却是半敞着的，坐在里边的副主编正在看稿，逆光中的那一颗脑袋，可爱得像宾馆里摆设的某种古董。

想想那种单间也是叫人住得很辛苦的。

一进门我就满足了苏通的心愿，他顺势就把小说递进了那个副主编的手里。那个副主编对我随后的自我介绍，只给了潦草的一个点头，转身就把兴趣投到苏通那边，转眼之间，他们便把苏童谈论得如同炸鱼。

好不容易我才插进了一句，我说苏童在《……》发过东西吗？

副主编瞟了我一眼，那模样好像在说，你是读者应该自己清楚。这时苏通把话抢了过去。他说肯定没有发过。苏通说，《……》就是《……》，绝对不会因为没有发过苏童的小说而有半点的掉价。他看着那个副主编，你说是不是？

副主编的表情显示得有山有水，苏通也因此感到得意。

转脸，苏童又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起来。好像说了苏童喜欢打球；说苏童刚生了一个女孩，名字叫做天米；还说了苏童不爱说话，不爱说话的原因是因为苏童的南方口音太重，常常词不达意。

我在一旁只好一味地听着，倒也听得津津有味的，毕竟头一次听到了许多关于苏童的细节。

临出门的时候，苏通礼貌地说了句打扰了。那副主编说没事，他说我们不是聊得挺好的吗。苏通乘机而入，他说我那小说就劳烦你多多指点了。副主编连声说着没事没事，我一定好好拜读。说完这么几句废话我们刚要转身，副主编突然问起了苏通，你写的东西跟苏童是一路的吗？苏通说不是。他说他们玩的是先锋，我苏通搞的是绝对的现实主义。他把玩搞两字说得用意十足，当天夜里我曾因为这两字的内涵，想跟他理论几句，最后考虑也许有伤于他，便没有开口。

2

第二天早上，吃早餐的时候，苏通不知如何错漏了一个机会，没能坐到那副主编的近旁，我发现那里正好有个空位，便赶紧坐了进去。副主编见我便问起苏通，我说不知他哪里去了，随着，我便问了一句，说苏通的小说夜里看了没有。副主编回答说看了。他说苏通那小说顶好读的，一读就读下去了。

我心想，到底是苏童的同学。

我问写得如何。

他说你没读过？

我说没有。其实我读了。

副主编拿着一个剥好的鸡蛋盯着看了又看，我想他是在思忖如何回答。一个剥好的鸡蛋有什么可看的呢？不就是接近于半透明的一种东西吗？咬进去，里边是团松散的蛋黄，不小心还会毫无理由地把人给噎了。我以为他会细心地先咬一口，然后慢慢地咀嚼着，以此拖延回答的时间。可他没咬。他的眼光最后从鸡蛋上落到我的脸上，他说苏通与苏童确实不同，阅读苏童是一种文字与叙述的享受，而苏通却让人的心灵受到震撼。

他对苏通的赞赏使我的心跳突然加剧。这种心跳是我的一种惯病，犯这种病的人很多，搞文学的人常犯这样的毛病。

我说，这么说苏通的这个小说是个大作品？

我有意把那一个大字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那副主编竟然是个光吃蛋黄的人，他把剥好的鸡蛋一分为二，然后只把蛋黄塞进张开的嘴里，一边低头嚼着，一边把剩下的蛋白合拢，放弃在胸前的桌面上，最后声音浑浑地说，大作品，大作品。这么说着的时候，许多蛋黄的粉末不时地飞身而出，广告粉似的涂满他嘴唇的四边。

就那三个字，我没有把话再问下去了。喝了一碗白米粥，咬了一个水晶包，我便起身离去了。我想苏童要是真的能在《……》发了他的那部中篇，那苏通在我们当地可就要成为苏童了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苏通。苏通听后脸色顿然云开日出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灿烂。随后他的眼光因此而四散漂浮起来，到处搜寻着那副主编的身影。那副主编已被一个优秀的女作家紧密地衬托着，在餐厅前的花圃里鸟一般在低头徜徉，而且越走越远。苏通的目光最后在一丛玫瑰的花丛上收了回来。

你不会是听错了吧？这句话后来他问了我三次。

我说没有听错，可我听见和你亲自听见却是两码事，我怂恿他抓个合适的机会自己证实一下。

他却说这可不能乱问。

我说那有什么呢？

他仿佛很有经验地晃了晃头。他说这也是一门艺术，不问有时候反而好，一问，有时反而弄糟了事。

我说那不一定。

他说你不知道。他说他会告诉我的你说会吗？

我说我不知道。

他说会的。

然而在后来的几天里，不知何故，那副主编就是不找他苏通。

3

笔会将结束的那个晚上，苏通终于按捺不住了。当时我们正在屋里，苏通突然问我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他一下？我说当然应该，不找就没有时间了。苏通在床上无声地躺了一阵，随后突然地跳下了床。他说对，我还是问问去。我说去吧。他就出门去了。

后来他什么时候回到屋里，我不知道。他出门没有多久我也出门玩去了，等我回到屋里的时候，苏通早已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，像条被人抽软了的黑狗，连电视也懒得打开。见我进来，他才从床上慢慢地坐起，然后骂了一声他妈的，他说，他叫我改。

我扫了一眼他刚才躺着的床上，他的那部小说已经默默地躺在了枕边。

我说怎么回事？

他说，他叫我改！

我说他怎么说。

他说，他叫我加进一种亮色的东西。

是不是让你写出最后抓错了人了，或者放了那个李后山？

这倒没有。苏通说，因为亮色并不等于最后了事。

那他叫你怎么改？

他让我写出有人告到上边去了，也就是有人出来反抗，他说哪怕那反抗是一种血的觉醒，对作品来说也是一种亮色。

我说这不容易吗？

他说容易什么？什么容易？

我说你那小说里的那一个我在后边不是失踪了吗？你就写他替他们上告去了。

苏通十分惊讶地望着我，他说你怎么跟他说得一模一样呢？

我说你觉得这样不好吗？

他口气一改，连连点头爆出了几声好好好，很好！

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我无意再给他压力。他说完一头倒回床上，一转眼却又跳了起来。他告诉我，在小说结尾的那一个时间里，他再一次出现在了那个遥远的村子里，但他不愿再写进去。

4

那一天的天上没有太阳，苏通再一次走近李后山家门的时候，也就无所谓太阳是否已经落山了，当时的时间自然是已经向晚。李后山的家里却只有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学四年级的女儿。李后山的女儿一眼就认出了苏通，她把他拦在了石阶的下边，她问苏通你是来拿钱的吗？

苏通听不明白。他问拿什么钱？我不是来拿钱的。

她说那你来做什么？

苏通问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把爸爸抓到乡里去的吗？

她说你不知道吗？

苏通说我来就是想知道这个事的。

她说，他们说爸爸把国家的手铐给打烂了，就把他给绑到乡里去了。

就因为这个吗？苏通问。

女孩说你真的不知道？

苏通说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吗？

女孩说是的，他们就是这么说的。

还说了别的什么吗？

她说，我只听到他们这么说。

苏通便骂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！

那女孩便瞪着眼睛问，你说他们没有道理？

苏通说你还小，你不懂。

女孩便问，那你知道我爸爸被罚多少钱吗？

苏通说他们来的时候没说吗？

她说他们没说。

苏通说你爸爸要是真的被罚了款，你们家怎么办？

女孩说，我奶奶今天早上为了那个钱给村长跪了大半个早上。

苏通一惊，他问为什么？

女孩说求村长给借钱呗。

村长借了吗？

听我妈妈说借钱他不给，所以我奶奶就给他跪下了。

你奶奶现在到哪去了？

她说给村长数树去了。

数树？苏通听不明白她的话。苏通问什么数树？数什么树？

女孩说，村长说借钱没有，他让我们家把山上的杉树卖给他，他可以出钱。

你说的数树就是你奶奶他们给村长砍树是吗？

女孩说不是砍树，是数树。

她说村长不让把树砍下来，他让我们家把卖给他的树做好记号留在山上，以后那些树就永远是他的了。

苏通的话已经问不下去了，他觉得眼睛有些酸，转身就走到家门前的那一棵大树下，坐在一条高高隆起的树根上，遥望着在黄昏中一条渐渐迷蒙的山路。

那女孩便站在自己的家门前久久地凝视着苏通。

后来的苏通没有等到那女孩的奶奶和母亲回来，就转身离开了他们的村子，苏通摸着黑，连夜走在回乡府的路上。

苏通说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，你说我如何忍心加进亮色？

我说你把这些告诉了个副主编吗？

他说我说了，可他让我把我写成挺身而出，把我的失踪改成到上边替李后山告状去。我告诉他，那样一改，那小说里的我就不是我了。可他就是说一定要改。

改？改什么改，我要是改了，我那小说里的我还是我吗？我改我的鸟！苏通突然愤怒地说道。

他说我不改。

我绝对不会改！

瓦城出版社

1

苏通突然闯进我们办公室的那一天，是他收到第三家杂志退稿的第三天的下午，时间距离那一个笔会已经很有些时候了，当时的瓦城正流行着南方那种烦人的细雨，他穿

着西服，却不带雨伞，那头本来相当潇洒的长发，被淋得就像抹了一层植物油的农村大嫂，办公室的同事们以为他是搞音乐的。我说他好像不懂音乐。那就一定是搞画画的。我说也不是。他们便说莫非是要饭的？我告诉他们，那是一位作家。他们的表情都惊讶了起来，说作家怎么是这样的呢？我说你们见过的当然不是这等的样子，因为这是一位不仅有才华而且很有个性的作家。在报社副刊，每天都要过手很多作家的作品，但见过作家的并不是很多，而那些称得上作家的是不会往《瓦城晚报》副刊送稿的，来的常常都是一些写小文小品的作者。

那天苏通带来了四条红塔山香烟。有一条是留给我的，他把它放在我床头的桌上。那时候的我也跟他一样还没有恋爱结婚，所以拥有的房子还是那种很小的单间。另外的三条，他让我帮他找一家单位，他想调进瓦城。我不能再待在瓦县了，他说再待下去不知哪一天的夜里我有可能自杀身亡。事情当然不会那么严重，但他进城发展的思路却是真的。县城到底不能等同于城市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带他摸进了我们晚报总编的屋里。这种事在办公室是不好出口的。出门的时候，苏通说把那三条烟一起拿上吧，我说要是他不同意呢，这三条红塔山岂不白搭了。他说一条烟谁能把你放在心上呢？我说主要是把握不大，要是绝对的把握，再多也可以拿。最后就先拿了一条。那条烟我们的老总是收下了，但人却收不下，说是副刊的人手已经够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们便拿了第二条红塔山摸进《瓦城日报》的总编家里，又一条红塔山被留下了，人还是进不去，因为苏通一个写诗的老乡已经事先借调了进来。苏通的那一个老乡也是县里那一次工作队的成员，但他没有等到工作队结束，就借调到《瓦城日报》副刊来了。没想到最后的一条红塔山却成功了。瓦城出版社的总编一听说是苏童的同学，脸面便鲜花一般开放起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的一个小儿子也正在北师大中文系攻读研究生。

先是借调，半年后，苏通就成了瓦城出版社的人了。

但进了出版社的苏通却不再动手写小说。我说你不能老是等着一个东西呀，你不是说那一次下乡可以写出八九个那样的小说吗？

他说写是容易的，只要那一部小说在哪一家重要的刊物上发了出来，哪怕只是通知采用，我就随后如法地炮制。

我说如果是我，我会写出来再说。

要是一直没有地方采用呢？他说，那我跟着写的那一大堆不就白写了吗？

当时我发现，苏通的心境已经停泊成了白纸一张，他希望他的那部小说成功，却又